

明清小说接受中“不善读”现象探论

纪德君

明清时期,小说接受中出现种种“不善读”的现象,并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,从而引起不少文人的关注与评议。他们认为,导致读者“不善读”小说的原因有多种,诸如:读者受到小说文本的诱导,有意对小说进行选择性地阅读,混淆小说所写的艺术世界与现实(历史)世界的差异,读小说时“各以其情而自得”,不了解作者的创作用心,不了解小说的意趣、笔法,等等。因此,要有效地避免“不善读”小说现象的发生,就需要对伤风败俗的小说实行禁毁或予以删改,并借助小说评点对读者进行正确的引导。

明清时期,小说对社会影响极其深广。清钱大昕在《潜研堂集》卷一七《杂著一·正俗》中曾慨叹:“古有儒、释、道三教,自明以来,又多一教曰小说。小说演义之书,未尝自以为教也,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,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,亦皆闻而如见之,是其教较之儒、释、道而更广也。”^①小说的接受层、读者面既然如此之广,而小说文本的思想艺术水平、读者的审美文化素养等,又良莠不齐,那么小说接受中出现复杂的阅读效应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彼时,有不少小说评点者就注意到明清小说接受中普遍存在各种“不善读”的现象,并对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,发表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观点。这些观点在当时乃至今天对于人们如何“善读”小说都不乏一定的启迪与教育意义。

一、“不善读”小说及其影响

古人曾将书比作药,认为善读之可以医愚。清袁枚说:“读书如吃饭,善吃者长精神,不善吃者生痰瘤。”^②书与药、饭一样,善读固然可以医愚、疗饥,不善读呢?自然也会中毒。清初刘廷玑在评点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时就说:

嗟乎！四书也，以言文字，诚哉奇观，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。不善读《水浒》者，狠戾悖逆之心生矣。不善读《三国》者，权谋狙诈之心生矣。不善读《西游》者，诡怪幻妄之心生矣。欲读《金瓶梅》，先须体认前序，内云：“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，菩萨也；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，禽兽也。”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，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，岂非禽兽哉。^③

清张安溪也说：“《聊斋》一书，善读之令人壮胆，不善读令人入魔。”^④可见，即便是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聊斋志异》这样的“奇书”，如果不善读之，也是容易中毒入魔的。清初鸳湖紫髯狂客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，他在为艾纳居士所著《豆棚闲话》第十二则所写的总评中说：“著书立言，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，亦在乎后学之善读。如不善读，则王君介甫，以经术祸天下，所必然矣。即小说一，奇如《水浒传》，而不善读之，乃误豪侠而为盗趣。如《西门传》，而不善读之，乃误风流而为淫。”^⑤其所谓《西门传》，即《金瓶梅》，该书极易被人误读。清初爱日老人在《续金瓶梅序》中就说：“不善读《金瓶梅》者，戒痴导痴，戒淫导淫。吴道子画地狱变相，反为酷吏增罗织之具，好事不如无矣。”^⑥丁耀亢也说，《金瓶梅》作者“原是替世人说法，画出那贪色图财、纵欲丧身、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”，惜乎其创作苦心很少被人领会，多数读者“看到‘翡翠轩’、‘葡萄架’一折，就要动火，看到加官生子、烟火楼台、花攒锦簇、歌舞淫奢，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、油尽灯枯之病，反说是及时行乐，把那‘寡妇哭新坟’、‘春梅游故馆’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”，致使“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”^⑦。张竹坡也指出：“男子中少知看书者，谁不看《金瓶梅》？看之而喜者，则《金瓶梅》惧焉，惧其不知所以喜之，而第喜其淫逸也。如是则《金瓶》误人矣。究之非《金瓶》误之，人自误之耳。”^⑧

至于艳情类的才子佳人小说，如不善读，则更易于想入非非，甚至误入歧途。清李仲麟在《增订愿体集》卷二中即说：“淫词小说，多演男女之秽迹，敷为才子佳人，以淫奔无耻为逸韵，私情苟合为风流，云期雨约，摹写传神，少年阅之，未有不意荡心迷、神魂颠倒者。在作者本属子虚，在看者认为实有……即有因果报应，但人多略而不看，将信将疑，况人好德之心，决不能胜其好色之心，既以挑引于前，岂能谨饬于后。”^⑨李氏认为少年人生阅历、文学素养有限，加上又有“好色之心”，故而在阅读才子佳人小说时，往往便误虚为实，“意荡心迷，神魂颠倒”。还有侠义小说，也容易贻误下层读者。石庵在《忤怨室随笔》中指出，《七侠五义》等侠义小说“最易于取悦下等社会”，盖因“下等社会之人类，知识薄弱，焉知此等书籍为空中楼阁？一朝入目，遂认作真有其事，叱吒杀人，藉口仗义，诡秘盗物，强曰行侠，加以名利之心，人人所有，狡诈之徒，既不能以正道取功名，致利禄，陡见书中所言黄天霸、金眼雕诸辈，今日强盗，明日官爵，则借犯上作乱之行，为射取功名之具，其害将有不堪言者”^⑩。

显然，读小说时认假为真，并欲效仿，这些都是“不善读”的具体表现。这也说明，“不善读”小说业已构成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，之所以引起文人热议，也是因为它已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。这里，我们不妨以《红楼梦》的接受为例，来看一看“不善读”酿成的苦果。清人乐钊《耳食录》二编卷八中记载：“昔有读汤临川《牡丹亭》死者，近时闻一痴女子以读《红楼梦》而死。初，女子从其兄案头搜得《红楼梦》，废寝食读之。读至佳处，往往辍卷冥想，继之以泪。复自前读之，反复数十百遍，卒未尝终卷，乃病矣。父母觉之，急取书付火。女子乃呼曰：‘奈何焚宝玉、黛玉？’自是笑啼失常，言语无伦次，梦寐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。延巫医杂治，百弗效。一夕瞪视床头灯，连语曰：‘宝玉宝玉在此耶！’遂饮泣而瞑。”^⑪这位痴心少女，由于不懂如何正确对待小说，深陷《红楼梦》而不可自拔，以至于香销玉殒，着实令人叹惋。清陈其元《庸闲斋笔

记》卷八在谈到“《红楼梦》之贻祸”时也指出,《红楼梦》一书,“严禁而不能绝,‘文人学士多好之’,‘闻有某贾人女,明艳工诗,以酷嗜《红楼梦》,致成瘵疾’”^②。其实,不仅女子读《红楼梦》有走火入魔者,男性读者中也不乏其人。清陈鏞《樗散斋丛谈》卷二记载:“邑有士人贪看《红楼梦》,每到入情处,必掩卷瞑想,或发声长叹,或挥泪悲啼,寝食并废,匝月间连看七遍,遂致神思恍惚,心血耗尽而死。”^③清邹弢《三借庐笔谈》卷四《小说之误》也说:“苏州金姓某,吾友纪友梅之戚也,喜读《红楼梦》,设林黛玉木主,日夕祭之。读至黛玉绝粒焚稿数回,则呜咽失声。中夜常为隐泣,遂得癡病疾。一日,炷香凝跪,良久,起拨炉中香,出门,家人问何之?曰:‘往警幻天,见潇湘妃子耳。’家人虽禁之,而或迷或悟,哭笑无常,卒于夜深逸去,寻数月始获。”^④这种将《红楼梦》所写完全当做真人真事并且深入其境、感同身受的读法,显然是错误的,其后果也是严重的。这也是《红楼梦》遭到清代统治者禁毁的原因之一。清末,定一在《小说丛话》中谈及小说改良问题时,也列举了不善读小说引起的悲喜剧:“小说者诚社会上之有力人也,读之改变人之性质。非独泰西有读小说而自杀之事,我中国亦然。吾前闻人言,有读《封神传》而仿其飞行空中之本领,竟作堕楼人;又有谈《西厢记》而恋莺莺之貌,欲步张生之举,寤寐求之,梦中遂大声疾呼‘莺莺’不绝,后以病故。”^⑤读者“不善读”小说的现象,既然已普遍存在,甚至还造成了严重后果,那么就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种现象究竟是怎么产生的。

二、“不善读”小说之成因

“不善读”小说现象产生的原因,无疑是很复杂的。对此,明清时期的文人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。

(一)读者受到了小说文本的诱导。读者是否善读小说,这无疑与小说本身的性质与特点有关。彼时,让读者“不善读”的小说,往往多为言情类小说或历史演义小说。言情类小说因为在礼教森严的社会环境中畅言男欢女爱,甚或在某些方面还刻意迎合读者的庸俗心理或低级趣味,所以很容易诱导“不善读”现象的产生。清黄正元在《欲海慈航·禁绝淫类》中曾转引袁了凡的话说:“人虽不肖,未有敢肆为淫纵者,自邪书一出,将才子佳人四字,抹杀世间廉耻,而男女之大闲,不可问矣。每见深闺女子,素行无暇,暂一披卷,情不自制,顿忘中篝之羞,遽作阳台之梦。亦有少年子弟,情窦初开,一见此书,邪心顿炽,终日神游楚峡,每夜梦绕巫山,或手淫而不制,或目挑而苟从,丧身失命,皆由于此。”^⑥的确,少男少女由于涉世未深,又情窦初开,对两性之爱有着本能的向往,所以一旦读到“邪书”,就很容易受到不良的诱惑,危害身心健康。清人张缙孙即说:“今世文字之祸,百怪俱兴,往往倡淫秽之词,撰造小说,以为风流佳话,使观者魂摇色荡,毁性易心,其意不过网取蝇头耳。”^⑦刘廷玑还对那些易于误导读者的小说进行了分类评价:“近日之小说若《平山冷燕》、《情梦栢》、《风流配》、《春柳莺》、《玉娇梨》等类,佳人才子,慕色慕才,已出之非正,犹不至于大伤风俗;若《玉楼春》、《宫花报》稍近淫佚,与《平妖传》之野,《封神传》之幻,《破梦史》之僻,皆堪捧腹;至《灯月圆》、《肉蒲团》、《野史》、《浪史》、《快史》、《媚史》、《河间传》、《痴婆子传》则流毒无尽,更甚而下者,《宜春香质》、《弁而钗》、《龙阳逸史》,悉当斧碎枣梨,遍取已印行世者,尽付祖龙一炬,庶快人心。”^⑧

与言情类小说不同,历史演义小说则因其所叙虚实相生、真假参半,也容易误导读者。清章学诚《章氏遗书外编》卷三《丙辰札记》:“惟《三国演义》,则七分实事,三分虚构,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,如桃园等事,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。”^⑨例如,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卷五中就列举了某些文人受《三国演义》影响,以虚为实的笑话:“崔念陵进士,诗才极佳,惜有五古一篇,责

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。此小说演义语也,何可入诗?何杞瞻作札,有‘生瑜’、‘生亮’之语,被毛西河诮其无稽,终身惭愧。”^②清王应奎《柳南续笔》卷一《生瑜生亮》也指出:“‘既生瑜,何生亮’二语,出《三国演义》,实正史所无也。而王阮亭《古诗选凡例》、尤悔庵《沧浪亭诗序》,并袭用之。”^③清平步青《霞外攬屑》卷七《瑜亮》还总结道:“小说俚言,阑入文字,晚明最多,阮亭、悔庵、豹人、杞瞻,亦沿而不觉耳。”^④

(二)读者有意对小说进行选择性地阅读。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,实际上已多有其趣味指向或接受期待,因而在阅读小说时,就难免会有意识地各取所需,对投合其心意的情节给予更多的关注,而对其不感兴趣的内容则予以回避或舍弃。如《肉蒲团》第一回即说:“近日的人情,怕读圣经贤传,喜看稗官野史。就是稗官野史里面,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,喜看淫邪诞妄之书。风俗至今日,可谓靡荡极矣。”^⑤清戏笔主人在《忠烈全传序》中也说:“比至《西游》、《金瓶梅》专工虚妄,且妖艳靡曼之语,聒人耳目。在贤者知探其用意用笔,不肖者只看其妖仙冶荡,是醒世之书反为酣嬉之具矣。然亦何尝无惩创之篇章,但霾没泥涂中者,安能一一在耳目间,故知之者鲜。”^⑥张竹坡在《金瓶梅读法》第八十二则中也指出:“不善读书人,粗心浮气,与之经史不能下咽,偏喜读《金瓶梅》,且最不喜读下半本《金瓶梅》,是误人者《金瓶梅》也。”^⑦清末曼殊《小说丛话》还说:“凡读淫书者,莫不全副精神,贯注于写淫之处,此外则随手披阅,不大留意,此殆读者之普通性矣。至于《金瓶梅》,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,然其奥妙,绝非在写淫之笔。”^⑧

(三)读者混淆了小说所写的艺术世界与现实(历史)世界的差异,或以读史的眼光读小说,或以索隐、考证的眼光读小说,甚或“卷入性”地读小说。

以读史的眼光读小说,这在历史演义小说的接受中较为常见。明胡应麟评论《三国演义》时就讥诮小说所写关羽秉烛待旦之事于史无据^⑨。而前文所举某些文人据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无稽之谈作诗为文,闹出笑话,其实也是文史不分导致的。

既然文化素养较高的文人阅读历史演义都会误虚为实,那么一般的读者就更容易认假作真了。清奕賡《佳梦轩丛著管见所及》记载,雍正六年,廷臣奉谕,各保所知者一人。护军参领郎坤因奏:“明如诸葛亮,尚误用马谡,臣焉敢妄举。”雍正当即叱之曰:“郎坤从何处看得《三国志》小说,即欲示异于众,辄敢沽名具奏,甚属可恶,交部严审具奏云。”^⑩这便是以小说语入奏议惹的祸。清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卷七也记载:“乾隆初,某侍卫擢荆州将军。人贺之,辄痛哭,怪问其故,将军曰:‘此地以关玛法尚守不住,今遣老夫,是欲杀老夫也。’闻者掩口。此又熟读《演义》而更加愤愤者矣。‘玛法’国语呼‘祖’之称。”^⑪

以读史的眼光读小说,固然与读者对历史演义的“小说”特性缺乏认识有关,但也与古代文史不分的传统分不开。夏志清曾指出:“在中国的明清时代……作者与读者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对小说本身更感兴趣。最简略的故事,只要里面的事实吸引人,读者都愿意接受,难怪多少世纪以来,中国的文人不断编撰轶闻趣事,而读者也似乎觉得这种作品永远有趣。那些职业说书人总是诚心恪守视小说为实事的传统看法……讲史小说自然是当作通俗历史来写,也是当作通俗历史来读的,即便是荒诞不经的故事,只要附会上一点史实,也很可能被文化程度低的读者当成事实而不是当作小说看。所以当描写家庭生活以及讽刺性的小说兴起时,它们那明显是虚构出来的内容,却常引起读者(以及本身即是文人的高明读者)去猜测书中人物影射的真实人物。”^⑫夏志清所说的这后一种现象,在《红楼梦》的接受中就很突出。自从《红楼梦》问世后,以索隐、考证的眼光来读该小说的人,可谓在在有之。如王国维《红楼梦评论》所说:“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,而读小说者,亦以考证之眼读之。于是评《红楼梦》者,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,此又甚不可解者也。”^⑬清末叶小凤在《小说杂论》中也说:“今世之谈《石头记》者,

寻章索义 穿凿附会 乃如汉儒之治经 真足令人绝倒席上也。”还说：“夫小说之有寄托固也，然不过大旨如此而已。若曰人人有隐名，事事有暗谜，则虽白尽孔夫子头发，亦未必能成。毕竟曹雪芹非圣人，如何有此本领？而今之人评《石头记》者，于穿凿之中，又俨然分洛蜀之党，嚣嚣终日，意若甚得，不知非特绝倒席上者有人，即曹雪芹有灵，亦将抚掌大笑，谓：‘吾始愿不及此矣。’”^②的确，索隐派对《红楼梦》的读解，虽然不能说没有可取之处，但多半属于揣测附会，随意捏合，甚或无中生有，刻意曲解。清王梦阮《红楼梦索隐提要》曾指出：“看《红楼》人有专从暧昧着想者，如迎春受虐，为非完璧，惜春出家，为已失身，宝钗扑蝶堕胎，故以小红、坠儿二名，点醒其事，湘云眠芍药裯，是与宝玉私会，为袭人撞见，故含羞向人。如此之类，也具只眼，然非作者本意之所注重，故不必好为刻深。”^③与索隐派相比，考证派所标举的自传说，也经不起推敲。王国维《红楼梦评论》针对“自传说”指出：“如谓书中种种境界，种种人物，非局中人不能道，则是《水浒传》之作者，必为大盗，《三国演义》之作者，必为兵家，此又大不然之说也。”^④无论索隐《红楼梦》中的真人真事，还是考证它为作者自写生平之作，都是不把《红楼梦》当小说来阅读，而是视为一部“秘史”来探幽。这样做，违背了一定的文学常识。当代小说家克非就说：“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小说，它的人物、故事、典型环境都是虚构的，是作者熔铸生活的结果。你考证什么呢？即或某些人物、事件、场景，在生活中曾有过原型，但经过作者头脑的发酵、熔炼、提炼、打磨，必不可少的改变，再和小说中的其他人其他事其他环境铸造在一起，就跟原型、原事、原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。这好比将粮食酿造成酒一样。二者虽有关系，无粮食便无酒，但酒是酒，粮是粮，是不同的东西，你不能把酒说成是粮食，把粮食说成是酒。原生态的生活，在未经作家头脑一系列的发酵和熔铸之前，是无法成为小说‘元件’的。这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常识。”^⑤

除了以读史、索隐、考证的眼光来读小说外，还有的读者对小说作出了“卷入性”的阅读、反应。梁启超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一文中曾说：“凡读小说者，必常若自化其身焉，入于书中，而为其书之主人翁。读《野叟曝言》者必自拟文素臣，读《石头记》者必自拟贾宝玉，读《花月痕》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，读《梁山泊》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。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，吾不信也。”^⑥后来，鲁迅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中谈到《红楼梦》的接受时也说：“但是反对者却很多，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。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，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，却自己钻入书中，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。所以青年看《红楼梦》，便以宝玉、黛玉自居；而年老人看去，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，满心是利害的打算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。”^⑦前文所述，一些女性或男士读《红楼梦》而走火入魔，其实就是混淆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、“卷入性”地阅读、理解小说人物故事所导致的。

（四）读者不了解作者用心之所在。金圣叹在《读第五才子书法》中曾说：“大凡读书，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。”^⑧如果不了解作者的创作用心，那么就容易出现对作品的误读或曲解。清刘廷玑在谈及风行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、艳情小说时，即指出这些小说所写的内容虽然有伤风化，“然而作者本寓劝惩，读者每至流荡，岂非不善读书之过哉！”^⑨清黄小田《儒林外史序》也指出，对于《儒林外史》，“不善读者但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，殊不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”^⑩。清末天僊生在《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》中谈到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时也说：“著诸书者，其人皆深极哀苦，有不可告人之隐，乃以委曲譬喻出之。读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，而以诲淫与盗目诸书，此不善读小说之过也。”^⑪

（五）读者读小说时，“各以其情而自得”。每一位读者由于其阅读经验、期待视野不同，即使他了解作者的创作用心，对作品的领会也仍然会有所不同，他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，

并且渗入他个人的思想情感。正如清初王夫之在《姜斋诗话》卷一中所说：“作者用一致之思，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。”^④吴趼人在《说小说·杂说》中就举例说：“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团》此著名之淫书也。然其实皆惩淫之作。此非独著者之自负如此，即善读者亦能知此意，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。顾世人每每指为淫书，官府且从而禁之，亦可见善读书者之难其人矣。推是意也，吾敢谓今之译本侦探小说，皆诲盗之书。夫侦探小说，明明为惩盗小说也，顾何以谓之诲盗？夫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。若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团》，淫者见之谓之淫，侦探小说，则盗者见之谓之盗耳。呜呼！是岂独不善读书而已耶，毋亦道德缺乏之过耶！社会如是，捉笔为小说者，当如何其慎之又慎也。”^⑤后来，鲁迅在谈到《红楼梦》的接受情况时也说：“单是命意，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，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。”^⑥

（六）读者不了解小说的意趣、笔法。读者是否善读小说，与其文学修养、理解能力等显然也有一定关系。清末梦生《小说丛话》即说：“吾所谓能读小说者，非粗识几字，了解其中事实如何如何也。善读小说者，赏其文，不善读小说者，记其事。善读小说者是一副眼光，不善读小说者又是一副眼光。”^⑦比如，关于《水浒传》，李卓吾在评点第五十三回时说：“有一村学究道：‘李逵太凶狠，不该杀罗真人；罗真人亦无道气，不该磨难李逵。’此言真如放屁！不知《水浒传》文字，当以此回为第一。试看种种摹写处，那一事不趣？那一言不趣？天下文章，当以趣为第一。既是趣了，何必实有是事，并实有是人？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，岂不令人笑杀？”^⑧这便对不了解《水浒传》创作意趣的村学究进行了辛辣嘲讽。清俞龙光《荡寇志·识语》也慨叹：“嗟乎，耐庵之笔深而曲，不善读者辄误解。”^⑨又如《金瓶梅》，其笔法也不易为人所解，清鸳湖紫髯狂客即指出：“其间警戒世人处，或在反面，或在夹缝，或极快极艳，而惨伤寥落寓乎其中，世人一时不解也。”^⑩至于《红楼梦》，读者如果不了解其笔法之妙，那么也难免会胶柱鼓瑟或谈玄说空。如王梦阮《红楼梦索隐提要》所说：“书中正寓夹写，比赋兼行，大有手挥五弦、目送飞鸿之妙。不善读者，一落迹象，谓宝、黛实有其人，荣、宁实有其地，刻舟求剑，便不足与言《红楼梦》。然全书行间字里，亦自有其事其人，若一味谈玄，谓百二十回皆子虚乌有，亦甚非《红楼》之真知己也。”^⑪清陈其泰还举例分析如何去领会《红楼梦》写人叙事的旨趣、笔墨，他说：“世俗之人，横一团私欲于胸中，便处处以男女相悦之心，揣摩书中所叙之事。如妙玉之于宝玉，亦以为迹涉狎昵，真隔尘障千百层，无从与之领略此书旨趣也。此种笔墨，作者难，识者亦不易。余少时读此回，亦不能无疑于妙玉，彼时只因未识得宝玉耳。及反复寻绎，将宝玉之性情行事看透，方能处处领会作书者之旨趣。”^⑫清末黄人《小说小话》也举例说：“贾宝玉之人格，亦小说中第一流……或曰：‘书中《西江月》两首，丑诋宝玉，可谓至矣，其人格之可珍者安在？’曰：‘君自不善读《红楼梦》耳，所谓但看正面，而不看反面者也。全书人物，皆无小说旧套，出场诗词，独宝玉有之。非特重其为主人翁，全书宗旨及推崇宝玉之意悉寓于此。’”^⑬

综合上述，可知读者“不善读”小说的现象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呢？

三、避免“不善读”小说之方法

明清文人在探讨读者“不善读”小说的成因时，也对如何有效地避免“不善读”进行了积极的探索。一些文人认为，既然“不善读”是由小说作品引起的，那么禁毁小说作品，也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举措。如刘廷玑即说：“读而不善，不如不读，欲人不读，不如不存。康熙五十三年礼

臣钦奉上谕云:“朕惟治天下,以人心风俗为本,而欲正人心,厚风俗,必崇尚经学,而严绝非圣之书,此不易之理也。近见坊肆间多卖小说淫词,荒唐鄙理,淆乱正理,不但诱惑愚民,即缙绅子弟未免游目而盻心焉。败俗伤风所系非细,应即通行严禁”等,谕九卿议奏通行直省各官,现在严查禁止。大哉王言,煌煌纶綍,臣下自当实力奉行,不独矫枉一时,洵可垂训万禩焉。”^②清江苏巡抚汤斌在《汤子遗书》卷九《苏松告谕》中也特意发布过禁毁小说的告示:“独江苏坊贾,惟知射利,专结一种无品无学希图苟得之徒,编撰小说传奇,宣淫诲诈,备极秽褻,污人耳目……深可痛恨,合行严禁。”^③不过,在小说已经风行海内、深入人心的时代,想通过禁毁小说来斩草除根,无疑是不现实的。如清钱湘《续刻荡寇志序》即说:“淫辞邪说,禁之未尝不严,而卒不能禁止者,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,而未尝禁之于阅者之人,即使能禁之于阅者之人,而未尝禁之于阅者之心。”^④

于是,又有人主张对那些有伤风化的小说进行删改再版。清余治在《得一录》卷一中即说:“此等书大可就其中用意增删,汰其不可为训者,而换其足资惩劝者,于意义则术等点金,于本书则功同完璧,刊板之费无几,而于世教实大有裨益,想有心人当相视莫逆,默为印可也。”^⑤余治这样说,当时还真有人这样做了,如清芝香馆居士即对《二奇合传》进行删改,并说:“第是书既主醒世,而写生之笔,有涉诲淫者则所宜摈者也。”否则,“有读书而反败行者,匪惟不善读书,亦书有以误之也”^⑥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出版社在编辑出版一些涉及性描写的明清小说时,也喜欢用“□□□□□□”或“××××××”来标示此处删除了多少字。但是,读者仍会用想象来填补,因此删改之法也无异于隔靴搔痒。

既然禁毁、删改小说收效有限,那么要求小说作者应有社会责任感,能为读者着想,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。清张缙孙《正同学书》针对那些炮制艳情小说的作者,就发出了这样的告诫:“黄童红女,幼弱无知,血气未定,一读此等词说,必致凿破混沌,邪欲横生,抛弃躯命,毁蔑伦彝,小则灭身,大且灭家。呜呼!兴言至此,稍有人心者,能无不寒而慄哉?”^⑦清崔市道人《醒风流序》也指出,艳情小说之弊,“在于凭空捏造,变幻淫艳,贾利争奇,而不知反为引导入邪之饵。世之翻阅者日众,而捻管者之罪孽日深,何不思之甚也?”因此,他在创作《醒风流》时,就有意摈弃色情描写,使“世之逞风流者,观此必惕然警醒,归于老成”^⑧。清蠡庵《女开科传引》也说:“若夫以妖艳之书,启天下淫男子逸荡之心,则妄语之诫,舌战之祸,固生平所自矢不为矣。”^⑨李绿园在写《歧路灯》时,也处处考虑给读者以正面影响,涉及人物淫行时,也总是一笔带过,并反复声明:“此处一段笔墨,非是故从缺略,只缘为幼学起见,万不敢蹈狎褻恶道,识者自能会意而知。”(第四十三回)^⑩“每怪稗官例,丑言曲拟之。既存惩欲意,何事导淫辞?”(第二十四回)^⑪还有一些文人,则主张借助小说评点来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小说。金圣叹即说:“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,将作者之意思尽没,不知心苦,实负良工,故不辞不敏,而有此批也。”^⑫张书坤在《新说西游记总批》中 also 说:“古人作书,其旨深奥。唯恐后人之不解,是以批而解之,以告后人。”^⑬他还指出《西游记》所叙“其事则极幻,其旨又极隐。若再不明白解说,深文浮衍,读者愈疑而莫知从入之处矣。是以开解处,只求明白爽快,即使三尺童子,读之亦显然易知。方上不负前人之作,下有裨于后之学者,良多矣。”^⑭

的确,一些文人为某些小说撰写的“读法”、“凡例”以及正文中的评点等,往往能从多方面开导、启迪读者。

(一)他们在评点小说时强调要把小说当做小说读,不能当做正史或真事来看。明佚名《新刻续编三国志引》即说:“大抵观是书者,宜作小说而览,毋执正史而观。”^⑮清花也怜侬《海上花列传·例言》也明告读者:“此书为劝戒而作……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,并无所指。如有

强作解人,妄言某人隐某人,某事隐某事,此则不善读书,不足与谈者矣。”^⑥清末叶小凤《小说杂论》也说:“是小说,则当以小说读之,此亦一天经地义也……我读《石头记》,只当作平常小说读,惟其只作小说读,乃见其有较他小说精妙处,苟能见得有精妙处,我已不负古人矣,复何求哉!”^⑦

(二)强调读小说应作整体观,不可割裂或零星读之。金圣叹《读第五才子书法》即说:“凡人读一部书,须要把眼光放得长。如《水浒传》七十回,只用一目俱下,便知其二千余纸,只是一篇文字。中间许多事体,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。若是拖长看去,却都不见。”^⑧张竹坡《金瓶梅读法》说:“《金瓶梅》不可零星看,如零星,便止看其淫处也。故必尽数日之间,一气看完,方知作者起伏层次,贯通气脉,为一线穿下来也。”^⑨

(三)强调读小说要领会作者的创作用意。张竹坡说:“读《金瓶》,当知其用意处。夫会得其处处所以用意处,方许他读《金瓶梅》,方许他自言读文字也。”^⑩林钝翁在评点《姑妄言》时也经常揭示作者的创作用意,生怕读者错会其意。如第七回夹评:“这一段才是书者之本意,那许多淫秽的事,千言万语不过是这几句的引头,看者需知作者之心。”^⑪第二十回回评:“详写曾嘉才之妻女子媳者,因一赌字,以至家破人亡。可见赌字大害,一至于此。贪赌之流见之,亦知稍警醒否?作者之意是要劝诸人不可如此,切勿错会起来,竟去效颦。不但负作者之心,真成一大笑话矣。”^⑫

(四)强调读小说要领会其叙事之法。金圣叹《读第五才子书法》即说:“吾最恨人家子弟,凡遇读书,都不理会文字,只记得若干事迹,便算读过一部书了……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,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。”^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庚辰本第二十五回评指出该书善于“以幻作真,以真作幻,看官亦要如此看法为幸”^⑭。

(五)强调善读小说者,既要入乎其内,又能出乎其外。清文龙在《金瓶梅》第一百回评道:“故善读书者,当置身于书中,而是非羞恶之心不可泯,斯好恶得其真矣;又当置身于书外,而彰瘡劝惩之心不可紊,斯见解超于众矣。又须于未看之前,先将作者之意,体贴一番;更须于看书之际,总将作者之语,思索几遍。看第一回,眼光已射到百回上;看到百回,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。书自为我运化,我不为书束缚,此可谓能看书者矣。”^⑮

诸如此类的评议,对如何读小说确有指迷之效。清末梦生《小说丛话》即说:“《水浒》评的好,《金瓶》评的亦好,圣叹以真能读小说之眼光,指示天下读者不少。”^⑯

明清文人对小说接受中“不善读”现象的关注与探讨,虽然究其本意来说,多半是为了救正风俗人心,且其所论也不乏偏颇或可议之处,但也自有其值得肯定或借鉴的地方。这种“不善读”的现象,不仅在明清时期广泛存在,今天依然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不断地涌现。比如,目前在形形色色的文艺创作中,“三俗”(即庸俗、低俗、媚俗)化的现象就比较突出,特别是网络小说中色情、暴力等内容司空见惯,在这种情况下,提倡“反三俗”,并引导读者培养健康的阅读情趣与良好的阅读方法等,就不乏积极意义。又如,近年来“红学索隐”又死灰复燃,并借助新媒体大张旗鼓,这对读者从文学的角度阅读、欣赏《红楼梦》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因此,现在重提明清小说接受中的“不善读”问题,应该也不无借鉴意义吧。

① 钱大昕:《潜研堂集》卷一七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,第282页。

② 袁枚:《随园诗话》卷一三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,第345页。

③⑬⑳② 刘廷玑:《在园杂志》卷二《历朝小说》,中华书局2005年版,第84页,第84—85页,第85页,第85页。

④ 此为冯镇峦《读聊斋杂说》所引,朱一玄编《聊斋志异资料汇编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第480页。

⑤④⑧ 艾纳居士:《豆棚闲话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,第142页,第142页。

- ⑥⑦ 丁耀亢《续金瓶梅》《金瓶梅续书三种》,齐鲁书社1988年版,第2页,第2—3页。
- ⑧ 张竹坡《金瓶梅读法》第八十二《张竹坡批评金瓶梅》,齐鲁书社1991年版,第46页。
- ⑨⑩⑪⑫⑬⑭⑮ 转引自王利器辑录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,第178页,第241页,第252页,第36页,第99—100页,第194页。
- ⑯⑰ 朱一玄编《明清小说资料汇编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,第365—366页,第76页。
- ⑱⑲⑳㉑㉒㉓ 一粟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·红楼梦卷》,中华书局1963年版,第347页,第349页,第388页,第301页,第294页。
- ㉔ 陈其元《庸闲斋笔记》卷八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200页。
- ㉕㉖㉗㉘㉙㉚ 陈平原、夏晓虹编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,第1卷第81页,第69页,第35页,第263页,第409页,第408页。
- ㉛ 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五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,第124页。
- ㉜ 王应奎《柳南随笔·续笔》卷一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137—138页。
- ㉝ 平步青《霞外攬屑》卷七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第559页。
- ㉞ 佚名《肉蒲团》,陈庆浩、王秋桂主编《思无邪汇宝》,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、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4—1997年版,第15册第134页。
- ㉟ 佚名《忠烈全传》《古本小说丛刊》第三十七辑,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,第1094—1095页。
- ㊱㊲㊳ 《张竹坡批评金瓶梅》,第46页,第42页,第45页。
- ㊴ 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四一《庄岳委谈》下,上海书店2001年版,第432页。
- ㊵ 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卷七,中华书局1982年版,第158页。
- ㊶ 夏志清《中国古典小说导论》,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,第15—16页。
- ㊷㊸㊹㊺ 黄霖、韩同文《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》下,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163页,第486页,第164页,第486页。
- ㊻ 克非《红学末路》,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,第446页。
- ㊼ 《鲁迅全集》九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348页。
- ㊽㊾㊿①②③④ 陈曦钟等辑校《水浒传》(会评本),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15页,第984页,第39页,第16页,第20页。
- ⑤ 朱一玄、刘毓忱编《儒林外史资料汇编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第282—283页。
- ⑥ 戴鸿森《姜斋诗话笺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4页。
- ⑦ 《吴趸人全集》第八卷,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,第219页。
- ⑧ 鲁迅《集外集拾遗补编·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,《鲁迅全集》八,第179页。
- ⑨⑩ 参见俞万春著《荡寇志》附录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1044页,第1053页。
- ⑪ 此为陈其泰评点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的批语,朱一玄编《红楼梦资料汇编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,第732页。
- ⑫ 《黄人集》,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,第308页。
- ⑬ 丁锡根编著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,第850页。
- ⑭ 周亮工《尺牍新钞》,岳麓书社1986年版,第438—439页。
- ⑮ 崔市道人《醒风流》,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,第1页。
- ⑯ 岐山左臣《女开科传》,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,第1页。
- ⑰⑱ 李绿园《歧路灯》,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,第395页,第235页。
- ⑲⑳ 刘荫柏编《西游记研究资料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,第576页,第574页。
- ㉑ 西阳野史《三国志后传》《古本小说集成》第3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万历刻本,第6页。
- ㉒ 韩邦庆《海上花列传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,第1页。
- ㉓㉔ 曹去晶《姑妄言》,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,第251页,第640页。
- ㉕ 朱一玄《红楼梦脂评校录》,齐鲁书社1986年版,第371页。
- ㉖ 朱一玄编《金瓶梅资料汇编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第656页。

(作者单位 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、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)

责任编辑 山木